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1.011

##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的民族观研究

李久旺, 马廷中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中华民国的建立, 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而在凉山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彝族精英, 通过研究凉山彝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的民族观发现: 面对民族危机, 他们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指出无论汉族还是彝族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 在外敌入侵情况下, 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奋勇抗敌; 他们宣传强调民族平等理念, 李仕安借助刘文辉的“三化政策”来宣传民族平等的重要性; 他们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请愿,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 他们希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因此大力宣扬彝汉一家亲, 积极促进民族发展。

**关键词:** 民国; 凉山; 彝族精英; 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 D633;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3)01-0067-07

## Study on Ethnic Views of Elite Yi People in Liangshan Region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 Jiawang, MA Tingzh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 Tour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moted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ere also arose in Liangshan region a group of elite Yi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modern education. By studying the ethnic views of Ling Guangdian, Li Shian and Qumu Zangyao,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mong the Yi elites in Liangshan, we found that, when faced with national crises, they stressed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elieved that, in the case of foreign invasion, both Han and Yi peoples belonged to the one Chinese nation and should unite to resist the enemy together. They publicized the idea of ethnic equality, and Li Shi'an used Liu Wenhui's "Three Governance Policies"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equality. They constantly petitione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or their people's political rights in a complicat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y hoped to build a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so they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dea that Yi and Han Chinese peoples are members of a single family,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Liangshan region; elite Yi people; ethnic view

欲探究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观, 须厘定一个概念, 何谓“民族观”?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观点、看法和态度, 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人们的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sup>[1]</sup>。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 民族问题也是近代史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步入民国以后, 民族主义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反帝、推翻专制统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 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种理论和政策<sup>[2]</sup>。整个民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团体对于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

看法。

这一时期, 位于中国西南的凉山彝族地区无论自然地理还是社会文化, 都十分封闭<sup>[3]</sup>, “民族”一词对于大多数彝族人来说遥远而陌生。但是这种封闭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社会一个显著变化是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精英, 他们不仅对世界政治局势以及国内的民族危机有着足够了解, 而且他们熟谙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这些精英在彝族内部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 同时也接受了良好的现代化学校教育, 是民国时期边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人物。而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是民国时期凉

收稿日期: 2022-09-23

作者简介: 李久旺(1998—), 男, 湖南长沙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历史文献学。

山地区中善于笔耕的三位彝人,李仕安也曾言“彝人当中,精通汉人情形的,一共有三位,就是曲木藏尧、岭光电和我”<sup>[4]65</sup>。关于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他们的民族观,即他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观点、看法和态度,目前学界研究较少<sup>①</sup>。因此本文希冀通过对民国时期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的文章以及相关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使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当时彝族知识分子对于民族问题的看法,达到“趋于历史真实”的史学研究目的,也对现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的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借鉴意义。

## 一、宣传中华民族认同以应对危局

中华民族形成非常早,但是“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提出则很晚,梁启超先生于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快速地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传播和使用。然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未放缓步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传统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条件和地缘条件失去后,原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结构和“天下体系”面临挑战<sup>[5]</sup>。这种挑战促使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sup>[6]</sup>。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的精英面对国际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国内愈加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力宣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的同时,冀望整个中华民族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能够团结一致、奋勇抗敌。

### (一) 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王明珂提出“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sup>[7]</sup>。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认为不管是彝族还是汉族,都是有着共同的“起源”,都是中华儿女,突出“彝汉一家”的同胞手足之情的同时,宣扬彝汉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曲木藏尧在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十分担忧中华民族的前途,指出中国境内不管哪个民族都是中华儿女,“大家都非高鼻蓝眼,通是炎黄子孙,……大家均是一个样吃苦受罪,同当亡国奴”<sup>[8]</sup>。并在《西南夷族考

察记》中驳斥彝族外来说,通过史料证明所谓“窜三苗于三危”(即现在的西南边)一带,三苗想来就是现在西南各省的“夷苗”等族,证明“夷族”<sup>②</sup>是中国本土民族<sup>[9]</sup>。同时他还从民族间的服饰以及各自的神话传说研究入手<sup>[10]</sup>,证明“夷汉”都是中华儿女,都属中华民族。曲木藏尧更是在民族教育中融入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如果我去年给他们制定一面旗子,用黄色的布,是表示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我又规定两句话:‘人类一家,天下共有’,要他们时常在口头念着”<sup>[11]</sup>,在强调“夷汉”都是中华儿女的同时,将古代传统儒家《礼记》中的“天下为公”理念与近代“人类一家”的思想相融合,在当时实属不易。

岭光电认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细胞,我们的天职是爱护他,保卫他,我们过去虽已尽了相当义务,而需要我们尽义务的程度远不如目前这样紧急。……同胞们,你们谁不爱国,谁不恨敌”<sup>[12]383</sup>,将中华民族的认同与爱国情怀联系起来,展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以及国家认同。岭光电还阐述彝族同胞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的祖先是爱国的,能够为奋起大无畏精神”<sup>[6]181</sup>。在国难日亟之时,岭光电依旧保持民族认同和自信,认为中华民族终会复兴,“立今日大中华民族已于生存之意识下觉醒,正奋其潜藏之伟力,挥其无穷丰富之生命向世界以谋其出路,我西南夷族为大中华民族构成份子之一,自当奋发追逐,完成民族之复兴”<sup>[13]</sup>。他还以“彝汉”文字演变史为研究视角,论述“夷汉”实则是同出一源,“夷胞在唐以前,为中国之一部……宋以后朝代迭有变更,而夷胞之为国民,始终如一”<sup>[12]66</sup>,这种中华民族下的民族同根同源观念也一直贯穿他的一生。李仕安则运用宗族观理论来阐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彝族在中华民族中,也算是一个大宗支,在云南有三百多万,川康约二百万,贵州约八十万,广西约五六万”<sup>[4]308</sup>,虽然宗族理论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也印证了李仕安对于中国境内的多民族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理论的认同。

### (二) 中华民族应团结一致抵御侵略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认为“夷族”与汉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携手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岭光电在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上学时就表达了对敌愤恨以及保卫国家的渴望之情,“我痛恨日本人,想打起来就狠狠教训他一下,把枪弹都反复地擦拭了几次”<sup>[14]238</sup>。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

侵,他主张“目前倭寇侵我,国难益急,使我边民渐陷入危难之中,此时不奋斗自救,更待何时?希望我边民能够效仿祖先精神,具必胜决心,努力奋斗,随时准备与敌厮杀”<sup>[6]81</sup>,因此他呼吁彝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一起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为了支持抗战后方建设,岭光电亲率2 000名彝民修筑乐西公路,连接四川和湘西前线的主要运输线川湘公路<sup>[15]</sup>。

曲木藏尧则认为抵抗外敌侵略的同时,应该增加彝人的认识,国家应该重视西南地区的彝族,“目前,我中华民族处于国难最严重时期。吾人对于西南国防与夷族,应有相当之认识与努力,唤醒夷族同胞,共赴国难,以挽救大中华民族之危运”<sup>[10]</sup>。在抗日战争这一国难当头时期,曲木藏尧更是在《新夷族》上呼吁团结民族,相生相养,共御外辱<sup>[9]</sup>,这种民族忧患意识也激发他对中华民族的信心和期待,因此他希望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上能够努力地发扬光大<sup>[16]43</sup>。

李仕安则将岭光电、曲木藏尧的呼吁付诸实践。正如李仕安在诗中感慨“国无宁日我无家,转徙颠连几岁华”<sup>[4]83</sup>,他认识到小家和国之大家不可分割的关系。1939年,他发起组织“凉山彝民抗日先锋队”,经当时四川省党部以及成都行营的同意,决定先组织一个四川省大小凉山党务筹备委员会,以吸收党员的办法动员彝族青年参军,他任筹委会委员兼秘书,成功组织起一支1 500人的“彝民抗日军队”。李仕安自任教官,负责操练队列,传授军事知识。一时间,大山深处军歌嘹亮,抗日宣传在大小凉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sup>[17]</sup>。面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三位彝族精英不仅极力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无论彝汉都是中华民族,而且为保卫中华民族在理论宣传和实践中都付出了不懈努力。

## 二、宣扬民族平等以争取政治权利

民族平等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的相互关系中,处在同等的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sup>[18]</sup>。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他在《宣言》中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sup>[19]</sup>。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自诩是孙中山事业的捍卫与继承者,因此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平等,蒋介石一直将其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因此凉山彝族精英把握这种有利的政治理论,不断宣扬民族平等的同时,也在当时的复杂政

治环境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

### (一)宣扬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的原则是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为争取民族权利的着重点。岭光电强调彝族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会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因此希望把民族平等原则落到实处,让凉山全民能够享受到民族平等的好处,“我们来欢迎平等,来帮助帮运。同时希望平等到边区后,不要成为少数搬运者的东西,应当成为共同享有的东西,便人人得到培养,个个成长成人,共同为祖国而努力”<sup>[7]355-356</sup>。曲木藏尧从“夷务”治理的角度出发,谈及民族平等应该做到合理处理好凉山地区的社会和民族问题,官员在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治理民族地区时应该做到“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切能‘己及人’,方不负民族平等之原则”<sup>[20]</sup>。

而李仕安则是借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的“三化政策”理论来宣传民族平等的思想。“三化政策”具体内容指“三化”及“六不”。“三化”指的是“德化、同化、进化”,在实践过程中具体执行的内容为“六不”,即“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费,不准打冤家,不轻用武器,彝汉平等,黑白平等”<sup>[4]85</sup>。三化政策是刘文辉根据对历代经边政策中威服、分化、羁縻政策在边疆治理实效分析和总结而得出,以德化政策代替威服政策,以同化政策代替分化政策,以进化政策代替羁縻政策。李仕安当时作为“三化政策”的倡导者,自然积极推行和宣传,为了更好地宣传“三化政策”的落实,李仕安在《新康报》《边政论坛》等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三化政策阐述》《三化政策漫谈》《再谈三化政策》《关于三化政策》《不轻用武力》《不准打冤家》《僱族参政问题》《禁烟彝务与吏治》《几个经边的成功人物》等十多篇文章,详细阐明了“三化政策”产生的历史渊源,具体内容,实施要点<sup>[4]85</sup>。因此李仕安在《三化政策阐述》一文中指出三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于民族平等实现的重要性,“我们要以德化先求民族分子的统一,以进化先求民族分子的齐一,以同化先求民族分子的如一,然后才能使大中华民国国内各族一律平等,才能有所谓民权普遍,民生乐和”<sup>[21]</sup>。

### (二)争取政治权利

民国建立以后,民国政府即宣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却游离于“五族共和”理论框架之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凉山地区的彝族精英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本民族追求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话语权在做不断地尝试和努力。他们利用著述、演讲、请

愿等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正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同时为本民族不断争取在政治上的话语权。

曲木藏尧是本文探讨三位彝族精英中最早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人,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年轻的曲木藏尧(汉名:王志国)便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因为彝人在当时影响不大,鲜为人知,便想化名为藏族名字<sup>[22]</sup><sup>189</sup>,以藏族的身份入学,这也是其名字的由来。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环境,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却面临着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境地,也因此不能得到一些应有的机会<sup>[23]</sup>。1930年爆发第三次康藏纠纷,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指挥藏军越过金沙江向康区发起进攻,直至1940年,纠纷的善后工作才得以和平解决。曲木藏尧抓住这一热点,宣传西康建省的同时,将“夷族”问题嫁接于其中。他撰文呼吁政府重视“夷族”,赋予“夷族”平等的政治权利,“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sup>[24]</sup>,这种呼吁虽然没有被国民政府采纳,但是他在南京期间结识了许多汉族同学及社会知名人士,如:为他以后所著《西南夷族考察记》题写书名的陆清一,作序的四川籍民主革命家,书法家谢无量 and 四川内江名人公孙长子,及龙云、杨森、刘湘、刘文辉等各地军政要人,他们对第一个毕业于蒙藏学校和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凉山彝族颇为器重。1931年,国民党中央委曲木藏尧以彝族党务宣传员之职(即国民党特派员),派往川、滇、康等省。曲木藏尧入川后,机关学校欢迎讲演,新闻记者前来采访,特别是由于刘湘、刘文辉出面迎接中央专员,一时轰动成渝两地<sup>[25]</sup>。曲木藏尧在南京的政治活动开始让一些高层以及社会舆论开始关注西南地区的彝族。

岭光电是继曲木藏尧之后,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争取政治权利的另一重要人物。民国22年(1933年)岭光电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1936年6月,云南的高玉柱和喻杰才到南京请愿,岭光电加入请愿团,他们认为“夷苗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因此呼吁朝野重视西南地区的“夷苗民族”,他们在《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中追求的权利与曲木藏尧类似,要促进西南夷苗民族之文化;要注重夷苗教育;调整治理夷苗政策;组建训练夷苗民族武装;准许“夷苗民族”,推选若干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sup>[26]</sup>。此次请愿影响很大,连蒋介石也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代表

告知请愿团,他“对于此项问题,颇为重视”<sup>[20]</sup><sup>87</sup>。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刻意淡化民族问题,对待少数民族的僵硬政策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1947年,国民政府筹备召开行宪国大,岭光电与查绍虞、罗正洪、傅佩云等组织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增加国大代表、立委、监委之名额,并广造舆论,“俾族代表岭光电先生适来成都,准备赴京请愿,连日在川大、华大等学府讲演俾族问题”<sup>[27]</sup>。岭光电的这两次请愿活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促进了民族间交流的同时,也让国民政府实现了他们的部分政治权利的诉求,国民政府调整国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分配10个国大代表的名额给西康土著居民,其中李仕安获得国大代表的身份进入国民大会,在刘文辉支持下,岭光电也当选为立法委员。

李仕安虽然没有像曲木藏尧和岭光电那样在南京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但是他在四川以及西康地区为彝族争取政治权利付诸不懈努力。1945年,李仕安在宁属屯垦委员会主办的《新康报》发表《边民的呼声》,同年在西昌“望远室”行宫,随刘元暄见蒋介石,并将刊登《边民的呼声》的《新康报》转呈给蒋介石。李仕安在《边民的呼声》一文中就强调国家应该重视凉山的“夷人”,应当积极推行民族地区的教育,也指出凉山“夷人”没有政治权利发表自己诉求的社会现状,“不但国民参政会中没有我们,省、县参议会中没有我们,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我们,甚至差不多的机关都在歧视我们……一个职业团体,也有代表代他说话,但我们二百万人却完全成了哑巴,没有地方诉苦”<sup>[28]</sup>。

### 三、倡导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发展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和前提,不仅是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力,而且也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可靠保证<sup>[29]</sup>。民国时期川西地区军阀割据,当时的政府也一直未将凉山纳入有效的管理,而凉山的军阀又继承清代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当时凉山地区民族关系的紧张。基于当时的这种社会问题,凉山的彝族精英致力于倡导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这种“构建”主要是从两方面来入手,一是以“彝汉一家亲”作为构建的理论,强调彝汉之间是兄弟,二是积极促进民族发展作为构建的实践。

#### (一) 提倡彝汉一家亲

凉山彝族谚语中就有“云和雾不能分,手和脚不能分,彝汉人民亲又亲”<sup>[35]</sup>的观念。“彝汉一家亲”

的观念也是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作为宣传和諧民族关系的理论出发点。岭光电从“夷汉”语言的语音上来论证“夷汉一家”<sup>[12]283-286</sup>观点,将汉族和彝族语言中语音中相同或相似的发言作了整理,认为“夷汉”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取其精华。他在叙述彝族的过年习俗时,曾经提到在五十年前汉彝杂居区,彝年热闹,以后渐渐衰退,杀猪的减少;汉年则越后越热闹。但是岭光电发现没土司管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他认为主要是杂居区彝汉互相影响,好礼尚往来<sup>[31]11</sup>。从过年习俗中,也可以看出彝汉两族互相影响,友好往来的和谐局面。

李仕安在《吁请政府及汉族同胞书》中着重强调汉彝是一家,他还从血缘历史上来阐述彝汉本是一家的理论,即汉彝两族,不仅在政治方面有联系,即在血缘方面也自始至终以多种方式在使其混同。他强调这种“混同”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战败以后不愿意归附的民众南迁一直到民国时期,彝汉两族血缘一直相互混合<sup>[35]</sup>。李仕安还从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出发,阐明“夷汉为一家”的客观事实,“汉夷名称尽管不同,而汉夷肤色骨骼之相同,已可证明汉夷的祖先是一家的,何况史书明明载明……可见夷汉之一部分,其血统早已融合。故今后我们在观点上,一定要认‘夷汉是一家’”<sup>[32]</sup>。因此李仕安处理在凉山地区代表中央的西昌行辕和代表西康省政府的宁属屯垦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时,曾坦言:“我希望彝族内部各派、彝汉之间能和睦相处”<sup>[4]209</sup>。李仕安希望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从而促进凉山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刘文辉让李仕安参与处理靖边司令邓秀廷死后的遗留问题,并事先征询了李仕安的意见。李仕安则建议刘文辉最好以退为进,知人善任,一视同仁,让彝汉和平共处,以保持社会安定<sup>[4]163</sup>。

曲木藏尧面对国民党主政时期未处理好民族问题而导致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认为彝汉两族若是处理不好关系,只会让外人因此来鄙视,从而用尽方法来分裂彝汉的同胞手足,使得彝汉两个兄弟相视为路人<sup>[8]</sup>。曲木藏尧以此表达如果没有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只会让外部敌对势力加以利用,从而达到分裂民族的目的,这也侧面地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彝汉一家的认可和赞同。彝汉一家的理念不仅仅是凉山彝族精英基于社会现实提出的新概念,而是在凉山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就有彝汉本是亲兄弟、同出一个母亲的传说。洪水幸存者居木武吾与天神恩体谷兹的三女儿兹俄尼拖成婚生三个哑巴孩子,“深山砍了三节竹来炸,家中烧

开三锅水来烫”<sup>[33]</sup>,首先烫长子,说声“俄底俄夺”,成为藏族的始祖,蹲起双脚坐;然后烫次子,说声“阿兹格叶”,成为彝族的始祖,跳到竹席上面坐;最后烫么子,说声“表子的咯”,成为汉族的始祖,跳到门槛上面坐<sup>[33]</sup>。由此可见,在凉山彝族创世史诗中彝汉同祖,从侧面体现了彝汉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过程,更是印证彝汉之间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 (二)积极促进民族发展

倡导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为给民族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在倡导构建彝汉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后,他们也积极为民族的发展而做出不懈努力。1937年初,越西县政府恢复岭光电的土司职位,直到1949年期间,岭光电对自己管辖的彝区,在文化、教育、卫生、习俗等方面都做了改革。在教育方面,岭光电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征彝民子弟入学,主要学习汉文和彝文知识。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还供应书籍、文具及部分清贫学生的伙食。在文化方面,岭光电请电影队到其辖区放映电影给广大彝民观看,每当所内彝民超度祖先,或过年过节,就在道场上或小学校内展览各种图片及机械模型,并派人加以解释。在体育方面,岭光电在学校设体育课,聘请武术教师来教武术课,操场上设沙坑、爬杆、单双杠、篮球场等,供彝民和学校使用。在医药方面,岭光电实行用药品来给彝民治病,同时又派了一部分学生到内地学习医药,在学校也设立医疗室,为学生及附近彝民治病,对治疗疟疾、梅毒、外伤、脓疮等,收到良好效果。在农耕方面,岭光电实行奖励农耕的政策,平均耕权。在辖区内岭光电还鼓励植树、给彝民家装亮瓦、禁止吸食鸦片和酗酒、废除勒索、降低彩礼标准、降低祭祀标准等等<sup>[32]118-131</sup>。岭光电在其辖区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促进了当地民族的发展,推动了所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

曲木藏尧认为推动民族发展进步的关键就是教育,和岭光电回家就办学校的理念一样,曲木藏尧在1931年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川滇黔边区党务宣传员的身份回到四川,就与二十四军刘元璋一拍即合,在西昌联中校内兴办“宁化学校”,由政府饬令各“夷”遣送幼童入学<sup>[24]190</sup>。可惜后续学校由于经费问题,举办了两期之后就停办了。办校失败之后,曲木藏尧意识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此他在撰文呼吁政府重视彝族的发展,希望从政府层面对民族地区的发展给予支持和

帮助,“那只有希望中央政府,以有力援助我边地弱小民族,唤醒边省有为的青年,大家一致的起来,作复兴大中华民族的工作,共谋民族的发展”<sup>[16]</sup><sup>[47]</sup>。李仕安也是继曲木藏尧之后,强调彝族在发展进步过程中应该发挥民族教育重要性的精英。他在《边民的呼声》着重呼吁政府应该重视彝族地区的教育。他认为彝族人聪明自信是不亚于别人的,只是因为受到没有受到相当的教育,彝族人能够背出几十代的族谱,能够数出全部彝族的支家系统,能够记几千个人的姓名,能够说几百个神话。在两盐的彝人,能够说汉、彝、摩梭等几种语言。他觉得如果拿这些精神去读书,他相信是可以记几万个公式,几千年往事<sup>[30]</sup>。三位凉山彝族精英在当时国民政府刻意淡化民族间区别、凉山部分地方民族问题不断的历史背景下,试图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着力提倡彝汉一家亲,呼吁当时的政府重视彝族。他们通过自己政治身份地位的便利为民族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惜由于当时的政府并不太重视,他们的努力取得的效果也有限。

#### 四、结语

凉山彝族精英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面对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都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们认为无论彝汉都是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团结一致,一致对外。他们抓住主流意识中民族平等的理念,加以宣传,强调各个民族一律平等,希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凉山地区能得到实施。他们宣扬民族平等理念,不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希望凉山彝族能够在政府中拥有政治话语权。在当时民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三位彝族精英着力宣传彝汉一家亲,强调彝汉是血浓于水的兄弟,积极促进民族的发展,希冀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受到“五族共和”理论的影响,当时不仅仅是凉山地区,整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精英在民国时期强调都对中华民族认同,如云南省主席龙云(彝族)面对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他为了挽救中

华民族不遗余力,为抗日战争出动了三个军,总兵力达22万,仅留第九十三军镇守滇越边境,又征送约5万人到中央其他部队<sup>[34]</sup>。云南纳西族的高玉柱、喻杰才谈及民族时认为“确知所谓夷苗民族为三皇五帝之真正后裔……是开发夷苗,所谓调整西南国防,亦可延续复兴中华名字最后之生命线”<sup>[28]</sup><sup>[59-61]</sup>,他们认为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是拥有共同的祖先,以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献言献策。贵州彝族的阿弼鲁德觉得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在不久之将来,喜马拉雅之最高峰,其将敲奏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钟声”<sup>[35]</sup>。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在那个风谲云诡的时代运用主流意识来谋求西南地区的民族权利和发展。温春来认为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认同、经济等方面已经具有高度整合的一面,这种主要表现在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sup>[36]</sup>。这种传统的整合性一直贯穿民国时期,接受近代化教育的少数民族精英对国家、中华民族展现出高度的认同,这种民族认同也伴随而来的是民族地区寻求政府中政治话语权的追求。在这种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渗透的情况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认同,使他们不仅为当时凉山地区的民族问题提供各种解决途径,而且在民族问题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中间者和排忧解难的调节者角色。

本文重点在探讨凉山彝族精英的民族观,但是当时凉山地区的普通民众的民族观呢?这也是本文之外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没有人去采访民族地区普通民众对于民族的看法,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失语者”。但是通过对凉山彝族的谚语研究发现,传统凉山彝族民众口口相传的谚语中就有“峨眉山、龙头山是姊妹山,彝族、汉族原本是兄弟”“天和地不能分,树和叶不能分,鱼和水不能分,彝和汉不能分”<sup>[37]</sup>,这些凉山地区口口相传的谚语虽然无法考究年代,但是也从侧面印证了凉山彝族民众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认可。

#### 注释:

- ① 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 西南经验》对岭光电、李仕安、曲木藏尧的身份认同以及民族认同包括三人的政治活动进行概述,胡聪和马廷中的《从〈新康报〉看彝族精英李仕安的“中华民族”观》一文,以《新康报》为载体探究李仕安的中华民族观。
- ② “彝族”这一称谓实际上是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在民国时期大多对彝族的称谓为“夷”“夷族”“保族”“保保”。为了避免叙述混乱,尊重历史事实,本文在引用原有历史文献中的“夷”“夷族”“保保”“保族”仍从其旧,但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时会将“夷”“保”改为“彝”。

## 参考文献:

- [1] 胡岩.马克思主义民族观[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14.
- [2] 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百年发展 1900-1999[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58.
- [3]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研究:第1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121.
- [4] 马林英.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 百岁人生川康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 [5] 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40.
-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220.
- [7]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8] 曲木藏尧.国难严重下之西南国防与夷族[J].新夷族,1936(1):48.
- [9] 马玉华.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五种)西南夷族考察记[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282.
- [10] 曲木藏尧.西南国防与保夷民族[J].地理杂志,1934,7(5):40-41.
- [11] 曲木藏尧.从西南国防说到保夷民族[J].聚星,1934,2(2):19-20.
- [12] 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上册[M].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 [13] 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等.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J].新夷族,1939,1(1):52.
- [14] 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下册[M].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 [15]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第4卷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511.
- [16] 曲木藏尧.从西北问题之严重谈到西南国防[J].西北问题季刊,1935,1(4):42-47.
- [17] 杨力,马军,徐奇民,等.雅安市文史资源挖掘与传承研讨文集[M].2018:217.
- [18] 金炳镐.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2006:302.
- [19] 周保同,陈建林.中国革命史[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128.
- [20] 曲木藏尧.治理宁属夷务之我见[J].西康青年,1940(1-2合期):58.
- [21] 李仕安.再谈三化政策[N].新康报,1943-12-28.
-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甘洛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西昌:甘洛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89.
- [23] 周宁.人文国际:第8辑 历史学专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51.
- [24] 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2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83.
-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M].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辑委员会,1997:361.
- [26] 高玉柱,喻杰才.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请愿意见书[J].新夷族,1936,1(1):62-63.
- [27] 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717.
- [28] 李仕安.边民的呼声[N].新康报,1945-10-03.
- [29] 金炳镐.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1-5.
- [30] 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 [31] 温春来,尔布什哈.岭光电文集:中册[M].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 [32] 李仕安.对边疆工作同志进一言[J].边疆服务,1945(8):4-5.
- [33] 《彝族传世经典》编委会.彝族传世经典 勒俄特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163.
- [34] 杨维武.璀璨的群星 昭通百年人物集萃[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72.
- [35] 阿弼鲁德.中华民族之复兴与西南夷[J].新夷族,1939,1(1):10.
- [36]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5.
- [37] 杨植森,赖伟,吉林布初.凉山彝族谚语[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47-48.